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

——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 李朝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关键词：冯玉祥；抗日；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10-0089-04

一、反蒋抗日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派员四处联络，策划共同反蒋，但都无果而终。对旧部无一响应，冯非常失望。1931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到：“恐怕军队中除了一些根本即是好的以外，营长以上的官长，已完全变为大军阀、小军阀、希望军阀、候补军阀之一路人矣。”“我的新路是与旧朋友离开的路，”但到底“如何作法，须细心想想。”“九一八”事变为其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契机。

“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潮流。潮流之一是十九路军势力；之二是原西北军势力；之三是以程潜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部分国民党元老、官吏和军人；之四是孙殿英、杨虎城等北方和西北实力派。反蒋派纷纷借呼吁抗日向蒋介石发起进攻。冯玉祥感到以反蒋抗日为武器，实现发展个人势力和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的时机降临。他当即指出，要抗日必反蒋，“我以为此时应成立雪耻军以对日人，而同时催贼走开。”他分别致电广州国民政府及熊希龄，申明要抗日，必迫使蒋“停职待罪，国人应否认南京政府。”单在11月17日，他一口气写了十几封信，不遗余力地向各方一再表明，蒋不下野，救亡图存绝难实现。

冯玉祥坚持“反蒋抗日”，代表了当时中国

社会一部分中间阶级的要求：不满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抗日，完成民族革命；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政治民主化，完成民主革命。由此可见，冯玉祥呼唤反蒋抗日，客观上是在寻找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道路。当然，此时它的认识并非自觉。其反蒋抗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乘机东山再起。同时，他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仅认为只要除蒋，就可抗日。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冯玉祥不仅看到东山再起有望，而且认为抗日障碍既除，团结抗战局面自应形成。25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实行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并应汪精卫之邀来到南京。可是，南京方面并未形成冯所希望的共赴国难的局面。汪精卫“倒蒋固仍在进行，而联蒋亦为事实”，害了“政治病”。他仍幻想孙科政府能立即行动起来，“精诚团结，抗战救国”。可孙科政府很快垮台，蒋介石卷土重来。蒋假装忏悔，对冯说：“现在国难当前，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①。冯认为“介石似有真悔之意，我为国家计，仍当与之合好如初，共赴国难。”^②遂产生了借重蒋恢复自己的地位，并实现抗日的幻想。“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摆出一付长期抵抗的姿态。冯认为“自赴京、沪为团结御侮奔走以来，今日总算达到了。”^③“抗日高于一切，我们应在既定的政策之下，同

舟共济”^[1]。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蒋仍抱定对日妥协方针。冯失望地“离开洛阳”赴泰山，“看时局变化如何，再出而图报国耳。”^[2]他知道要实现抗日主张，必须有实力和地盘。韩复榘虽在表面上对他很尊重，实际却认为“冯先生思想过左，他的左右都是共产党”^[3]，颇有戒心，使他在山东开展抗日，尤其是军事活动的设想不可能实现。1932夏，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及其部下张自忠等与冯关系较深厚，冯希望能在他们的掩护下进行抗日活动，以开创个人出路和民族出路的新局面。当时，共产党根据日本侵华形势和平津、张垣长城一线聚集了许多杂牌军的情况，派人与冯商量，准备以察哈尔为组织抗日的根据地^[4]。10月9日，冯玉祥到达张家口。当天即发出通电，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认为“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舍此别无他途。^[5]这表明冯玉祥的反蒋抗日由宣传联络转向武装斗争新阶段。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爱国民众非常不满，国民党内不少人士也认为抗日必先倒蒋。在反蒋抗日目标下，原先政见不同的派别关系有所缓和，且日趋聚为一股比较强大的反蒋抗日暗流。1933年初，山海关失守，许多人士及抗日团体把目光投向冯玉祥。至4月上旬，60个以上的团体曾电促冯领导抗日。^[6]他与同样有反蒋抗日要求的胡汉民、李烈钧等加强联系。1月7日，致电双方提出两个口号：“一、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二、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7]

南京政府不愿看到出现冯玉祥在察哈尔率军抗日的局面。王法勤等先后前来游说，望其离开张家口。冯反就军事上的抗日准备提出12条措施作为答复。^[8]他告诉王法勤：“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9]3月，蒋介石到保定，请冯前去会谈。他拒绝赴保，答以5项要求：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餉械弹药；抚恤伤亡；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10]4月初，冯致函蒋，坚持“对日寇拼命抵抗，用全力收复失地。”^[11]5月26日，冯玉祥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指责“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宣称“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前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

自由。”^[12]

该通电实际上以反蒋抗日为宗旨，但为避免给蒋武力打击以借口，通电只是指责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救国，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但因蒋坚持不抵抗政策，所以激烈主张武装抗日就意味着反蒋，倘若其抗日行动能得到广泛支持，便有可能重新确立其原有地位^[13]。美国学者 Youli Sun 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14]

抗日同盟军连战皆捷，各地民众极为振奋。连当年参与组织“反赤大同盟”的章太炎，针对“察哈尔赤化了”的叫嚣，称“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15]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对抗日同盟军持反对态度，准备武装攻察。正如冯玉祥旧属简又文所分析的，“冯氏处境，更为困难，既苦兵力不足，而所统之杂军，类似乌合之众，”“况且经济支绌，供养不足，军械尤缺乏，再难久持。而在军事上，则前有中央军之压迫，后有日军之进攻，益难支持，延至7月下旬，冯玉祥不得不亟筹脱身下台之善法”。^[16]冯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惟恐使宋哲元失去察哈尔这块地盘，引起旧部不满，断绝他靠旧部再起之路，故极愿宋回察主政。可是宋却“不愿在抗日倒蒋旗帜下”听他指挥。^[17]无奈之下，8月6日，他通电全国，宣布即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办理。他本打算仍留在张家口待机再起。但蒋、汪一再促其离察入京，宋哲元也希望他离开。14日，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再赴泰山隐居。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既是要抗日，也为能东山再起。东山再起的企图提供了他到察哈尔抗日的重要动力，而以反蒋抗日为重的宗旨使其此企图顺应了民众愿望，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冯最后不得不解散同盟军，从根本上讲是他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双重目标矛盾激化的产物。当他意识到在重重压力面前，如果一味坚持下去，不仅对抗日大局益处不大，而且将非常不利于自己发展个人势力时，便收束军事。于是，察哈尔抗战嘎然而止。

二、促蒋抗日

重上泰山后，他坚持反蒋抗日。对福建事变，他有响应的准备但尚未就绪。^①他希望韩复榘和宋哲元在北方响应，但都只被敷衍。他认识到依靠旧部不可能达到反蒋抗日尤其是反蒋目的。不论是为国家前途还是个人出路，都要另寻办法。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中。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两党政策有所调整。这些变化，为冯玉祥寻求救国救民及个人出路提供了机遇。1935年7月20日，李烈钧来函劝冯到南京，从南京政府内部团结抗日力量，同时可以做主张抗日的在野派以及各杂牌力量的代言人。李自称这是“新的奇伟办法”。^②10月19日，蒋介石邀冯晋京。冯玉祥23日复电提出奖励抗日精神，做好抗日准备等。同日，韩复榘表示愿做冯赴南京的后盾。冯玉祥是一个务实的人，很难说在失去旧部对他反蒋抗日的实际支持后，依旧有必倒蒋不可的念头。蒋很快致电接受其所提救国建议，使他感到蒋也有抗日可能，于是动身赴南京。

蒋介石表现得对冯非常尊敬，多次“请示”治国方略。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又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③蒋的恭敬和对日政策向积极方面的变化，更增强了冯的蒋可能抗日的判断。他决心“为国相忍”。冯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虽有名无实，但却使他感到施展救国大计和谋求个人政治出路更有了一定基础。冯此时对蒋仍有不满，但决心“既不骂人，亦不走开”，“非促成抗日不可。”^④这表明，冯玉祥已从反蒋抗日转到促蒋抗日。

冯玉祥经常致函或与蒋面谈，谈抗日之必行、抗日的准备等。他还竭力促进国民党上层的团结，数次敦请胡汉民、李宗仁等人晋京共筹国是，一致抗日。冯还一再向旧部说明蒋是要抗日的，称“中央待人以诚，必有善策与实事以慰我爱国者。”^⑤希望他们服从中央。

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揭起反蒋抗日的旗帜，内战如箭在弦。冯非常焦虑，“如果开仗，定然亡国”。^⑥他认为“抗日的无论如何必须大家来抗日”^⑦，“国难严重至此，非在团

结中求办法，必有极大之不幸的事发生”。^⑧他向两广方面表示同情，又多次拜见蒋要求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同时，他也向西南方面尽力说明，蒋也有抗日之意，不过二者间“对于救亡图存之骤有轻重缓急之差异”，希望他们避免与中央对立，指出：“只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得如同一家人一样，集中力量作艰苦的奋斗，才可以得到救亡图存的最后胜利。”^⑨两广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主要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作用，而冯的斡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对爱国群众的抗日要求虽有所回应，但仍以高压手段压制抗日民主运动。冯玉祥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支持抗日民主运动。“七君子事件”后，冯玉祥立即参与营救行动。1936年11月26日，他致电蒋称“其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⑩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劝告，拖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七君子事件”对蒋、冯而言，一个下令关，一个主张放，表明二人虽在要抗日上逐渐一致，但在如何对待民众运动问题上依然明显分歧。蒋开始注意到日军入侵的威胁，然而更看重抗日民主运动对“民国”的危害。冯把民众运动视为抗日的基础，认为不发动民众不足以抗日，并以此希望蒋有所觉悟。抗日使蒋、冯走到一起，但对民众的不同态度则预示着他们联合的暂时性和最终破裂的必然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时局转变的枢纽，解决得好，有可能迎来团结抗日的前途，否则，会使内战重新激化。冯玉祥虽无实权，难发挥大作用，但他反对使用武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表示“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⑪同一天又以类似内容分别致电杨虎城等，希望他们“就近维持，务以介公回京为要。”^⑫13日，其夫人李德全去见宋美龄，表示愿陪她去西安。次日，他又请马相伯去“北平转西安营救之”。^⑬张学良也对冯寄以厚望，14日，发电报邀请他去西安共商解决方略。从冯上述言行可知：冯同情张、杨；主张释蒋；力主和平解决，为抗日保存国防力量。他提出的和平解决要早于中国共产党^⑭，对促成和平解决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冯能提出和平解决，表明了

他为实现抗日前途光明磊落的品质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及时从逼蒋抗日转到联蒋抗日，通电“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冯玉祥、宋庆龄等赞同中共的建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指出：“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外与英、法、俄、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1]在国共合作抗日谈判中，蒋介石缺乏诚意，迟迟达不成实质协议。冯一再劝说却难以发挥作用。他借回巢县老家之机，不愿再回南京，表示：“他们如不抗日，把我们弄到南京住，则无异养猪，我们若不为抗日而奋斗，则是自己把自己当猪待”。^[2]全面抗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冯如释重负，对蒋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3]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也逐渐转到抗日上来。而要完成抗日大业，就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冯玉祥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为实现团结抗日而鼓与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这说明，冯玉祥在这一时期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实现了谋求个人与探求国家民族出路之间的统一。

三、拥蒋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勉励旧部“须以全力抗战”。冯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所属军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没有谁真正听他指挥。冯向蒋抱怨：“我有两个任务，一为等死，等日本人来杀死；一为做诗。”^[4]不满归不满，但他仍不遗余力地服务于抗战。在抗战初期，冯玉祥几乎每天都就抗日问题打电报给蒋介石。8月19日，他致电蒋指出：“在大沽方面，敌军纷纷增援，非窥察我津浦，即扰乱我平汉。”^[5]次日，又就加强抗日外交、抗日人选、动员民众等致电蒋介石，“以备采纳”。单9月6日这一天便就抗战事宜给蒋连发三封电报（函）。

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原则分歧。两条不同的路线，反映了国共两党对抗战战争的领导权之争，这是决定抗战走向的根本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蒋一度抗战较努力，还由于对其本质认识

不清，更因冯所处的国民党高层地位，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从促蒋抗日转到了拥蒋抗日。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抗日较积极。冯玉祥深受鼓舞，希望各种力量能团结在蒋介石之下，彻底打败侵略者。1937年7月29日，冯对程潜谈到，“介石成功即为中国之成功，中国之成功即吾人之成功。”^[6]11月6日，他指出要“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7]11月8日，他告诫旧属要服从蒋介石，“当国家大难之时……若对内有不平之念，则为民族敌人作工矣。”^[8]作为一个有20余年军阀史，习惯于拥兵自重，惯以机会主义处世对敌的冯玉祥来说，对旧属如此谆谆教诲，其拥蒋抗日决心可见一斑。虽然冯对蒋的一些做法也有不满，但在一切服从抗日大局下他告诫自己要隐忍。甚至他所担任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被取消后，仍旧抱定为打败日本而拥蒋抗日的信念。在其“拥蒋抗日”中，“抗日”是目的，也是“拥蒋”的先决条件。在武汉失守前，冯玉祥对李烈钧表示：“蒋介石若抗战，我就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9]为抗日而拥蒋是冯玉祥拥蒋抗日思想的真谛。这实际上是对他在第二次上泰山时提出的“以抗日与否划分敌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

在统兵作战时，他要求士兵“作战先用子弹；子弹用完了，用刺刀；刺刀钝了，用枪头；枪头破了，用口咬。”已失去军队的冯玉祥，无刀无枪，不能直接上战场杀敌，只可实行“用口咬”——用口舌和笔墨劝蒋坚持抗战。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胜利，他不仅每次见到蒋都要用言语劝说，而且还致函、电蒋介石数十万言。在向蒋进言时，他也知道蒋对他的意见绝大多数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常引起蒋及其亲信反感。但他仍告诫自己“对抗日大计，当说的必须说，当做的必须做；做而有困难，是我做得不好，不能怪环境。”^[10]他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常说别人不能说之话，发别人不敢发之言。

1938年10月，李烈钧告诉冯玉祥，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蒋介石对和战问题更加动摇。他非常焦急，在得知消息后不到20分钟，便从桂林出发赴衡山见蒋。到衡山，得知蒋已到长沙，又马不停蹄驱车赴长沙。他以《三国演义》上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话来劝蒋，即“任何人都可言和，惟主公不可。”鼓励蒋应有孙权拔剑击案自誓的决心。接着他又陈述了14条意见，包括“为适应抗战新阶段的形势，应使政府成为真正的抗日政府”，“真正做到官兵一致”，等等。^[11]

